

音调未定今岁定

□弋舟



至少,于我而言,“中国”这个词,在这一年空前地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领受的大词。当然,她那些基本要义恒在,是祖国,是家园,是我们文明血脉之所系,但在这一年的疾风骤雨之下,宛如经过了冲刷,一些崭新的光芒在她的语义之上重放。我想,经历了这个庚子年,“中国”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焕然的新词。

庚子将至时,《现代快报》找了9位属鼠的读书人祝福新年,于是写了小文,自称“鼠辈”;恰好《作品》欲在2020年推出“经典70后”这个栏目,承蒙相约,稿子却拖到了西历的岁末,眼见要爽约,情急之中,干脆也以《鼠辈》为名,做出了一则短篇小说。属鼠的人来到了鼠年,在“本命年”的规则下,终究会围着自己的生命感打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彼时,没有人嗅到疫情的味儿。

在《鼠辈》中,因为情节的需要,我引用了朱维铮先生大作中的一段话:通观那以前的中国都市史,不论由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导致各自的盛衰荣辱,也不论那些盛衰荣辱过程或骤或缓……引用时,这段话并无特殊的所指,就像小说里所交代的那样,不过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随机翻开一页之所见;然而此刻“盘点”旧岁,我不禁对着这段话再三琢磨起来,琢磨再三,亦不禁要感叹,似乎自己的这个本命年,冥冥之中就被这个句子所笼罩。这种宿命感,大约也能算是中国人独有的况味吧。

中国,史,盛衰荣辱,或骤或缓——将这个句子拆开,留下的,也许正是庚子年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受深切的一些词组。至少,于我而言,“中国”这个词,在这一年空前地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领受的大词。当然,她那些基本要义恒在,是祖国,是家园,是我们文明血脉之所系,但在这一年的疾风骤雨之下,宛如经过了冲刷,一些崭新的光芒在她的语义之上重放。我想,经历了这个庚子年,“中国”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焕然的新词。这其间,必然有着“史”的记忆与“史”的勾连,也直接相关着“盛衰荣辱”,让我们感慨于历史“或骤或缓”的伟力。

这样的感慨,却也只能发生在此刻的“盘点”之时,实际上,就像身在其中,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见证着历史一般,这个庚子年,我们依旧是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日子里经受着时光的熬炼。

疫情最为凶险的日子,《美文》召集大家作文,我写下了《钟声响起》这篇小文,纵观逝去的一年,这也许是我写下的最为动情的文字:当那一天来临,世界再度川流不息,小区保安不再限制你的腿,你应该马上去就探寻你身边不远处那座大钟的位置,你将满含着热泪去搞明白,你的生活原本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谁在黎明清扫着马路,是谁在将书籍、牛奶递在了你的手里,是谁在装模作样,是谁在脚踏实地,是谁,不懈而又卑微地劳作着,在让钟声准点响起。这样的表达,不过是来自禁足时期自己最为切肤的感受,是非常时期,让我瞩目于那些太平之时视为天经地义的一切,瞩目于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运转动力,瞩目于万千沉默的劳动者。由此,我知道了“寻常”的意义。

非但知道了“寻常”的意义,作为一个小说家,在这一年,我亦部分地感受到了“虚构”的无力。被我视为“最为动情”的这篇小文,正是一次“非虚构”的书写,我感到,相较于自己惯常高举着的那面“虚构”之旗,有时候,以一种“非虚构”的“寻常”作为平衡,也许才能抵近文学的本质。

恰好,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也在庚子年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在新书分享会上,我对评论家木

叶坦陈,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次“写作伦理”的矫正。这不是虚言,我所说的“写作伦理”,也不仅仅是指“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更是指由这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所承载着的文学精神。到大地上去,到寻常中去,对于我而言,这些都是达成美的崭新路径。

当然,如此认知,并非是要贬低小说写作的价值,否则,我也不会在这一年写出了新的短篇小说集。一如既往,新的小说集仍然以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来命名——《庚子故事集》。和以往的集子并列,这个系列的作品被中信出版社冠名为“人间纪年系列”,对此,我深表认可,“人间”与“纪年”,如今都是能够驱策我写作的动力。

《庚子故事集》中的部分篇章我直接以“当下”作为背景,也因此,这本集子的“纪年”性质便显得尤为突出。也许这种写作本身就是试图降低我那过度凌空的“虚构”姿势,为此,我也不免要承受一些潜在的风险——在虚与实的交汇处,我们总是难以找到最为准确的尺度。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正是我在这个阶段的困境所在。这绝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幸,这些作品依然得到了体谅与厚待,《人类的算法》进入了“收获文学榜”,《掩面时分》进入了“城市文学排行榜”并获得了《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这些褒赏,对于一个身在困境中的写作者而言,无疑都是莫大的鼓励。

盘点庚子年的个人出版,《空巢》《庚子故事集》《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一本非虚构,一本虚构,一本是散文集——被收入“小说家的散文”名下,姑且算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吧。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也令人吃惊地给出了我当下的写作状态,那就是:一个“未定”的小说家,力图在虚与实的摆荡之下,求得自己的“定”。

这就又回到了朱维铮先生的那段话,而那段话,我是引自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

音调未定,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你看,我在自己的本命年,以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宿命感,不得不再一次依赖“隐喻”这个词;要知道,庚子年初的时刻,我一度是何其厌恶它,觉得在庞然的劫难面前,这个过于书房腔的词实在是显得轻佻。然而,此刻将自己摆放在时光里,以一种“盘点”的心情整全地回溯一年的身心历程,我又不得不依赖它所能蕴含着的一切意义,也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匮乏。

作为一个“鼠辈”,过了这个本命年我便是“望五”之人了,那个“天命”是否可知,如实说,我依然毫无把握,但是至少,我在这一年被“中国”与“史”,被“盛衰荣辱”与“或骤或缓”重新启蒙,在具体而微妙的写作伦理中矫正着自己,开始向往大地,敬重寻常,那音调未定的个体生命,渐渐有了确定的迹象。我想我将沉静。



剪纸的窗花

□邹凤岭

子鼠入暮,丑牛伊始,阳光洒满了新春。迎佳节,友人寄来贺岁品,视觉唤童年。“小儿著鞭鞭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金牛奋蹄春来早,人勤地丰贺新年。剪纸的窗花,杨万里的《观小儿戏打春牛》图着实美丽。

剪纸的窗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不识字,常常将那剪纸里的传统故事讲给我们听。村子上,哪家有青年男女结婚大喜日,定会请母亲为之装饰婚房。剪纸的窗花,大红的喜字,贴上明亮的窗子,祝福里更增添喜庆的色彩。

过了腊月二十三,杀年猪,炒年货,贴春联,忙年的气息充满了小村庄。母亲从晨起到炮仗,夜以继日忙着剪纸。村子上,新过门的媳妇们,赶在大年三十前,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母亲身边,讨教剪纸窗花的技艺。母亲戴着老花镜,一刻忙不停,剪下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看那《童戏春牛》《金鸡报春》,还有那《燕剪春风》《龙凤呈祥》等,栩栩如生,动静相宜。赶在大年三十晚,一幅幅红春联,一幅幅红剪纸,装扮那一栋栋苍苍钩玉的屋子。乡村瞬间被染上了红装,迎来浩浩荡荡的春意。一年又一年,年年庆有余。

剪纸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早在春秋时期,人们通过镂空

雕刻的技法,在一些薄片上制作工艺品,为真正意义上剪纸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有了纸张,促进了剪纸的出现、发展和普及。到了北朝时期,人们剪出各种美丽图案花纹。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唐代剪纸工艺品,已经有了高超的技艺,表现出一种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传统剪纸艺术,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明清时代走向鼎盛,民间将剪纸艺术广泛运用于彩灯、扇面、刺绣等工艺品的花饰纹样,美化家居和生活环境。直到今天,贴剪纸窗花仍为不可或缺的新春佳节装饰品。

过大年,回故里,走在集镇沿街市场上,办年货,购年画,人来人往,剪纸的摊位也围观者众。又到新春佳节,我展开一张张红色的宣纸,挥毫泼墨写春联。“灶火门神,酒酌醉酥,桃符尽书吉利。”满满的祝福语,拙笔写成也欢心。老伴走过来,看到书案上还有剩下的大红纸,手心痒痒的。坐下来,身边围着小孙女,剪纸窗花好惬意,不一会儿就剪出了《梅雪迎春》《蝴蝶吮花》等窗花。我将剪纸小心翼翼地贴在了窗子上,透过明亮的玻璃,仿佛看到了腊梅傲雪、蝶舞春花的光景。

红红的窗花,和着喜庆的年味,迎来报春的钟声。祝福的酒杯里,盛满牛年奋进的辞意。



愿望(外一首)

□杨加方

过去一年
孩子学习出现了各种状况
父亲做了一次手术
从来不进医院的母亲
总是咳嗽不止
我的工作
就像一个快跑完全程马拉松的人
突然发现
终点线又被人往后移了一万米

年近五十
新的一年
我有三个愿望
仅只有三个愿望——

孩子学习认认真真
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

父母身体健健康康
能够陪伴我们久些,久些,再久些

我工作顺利顺利
心情不寂寞

等待

那个叫玉多的女人
每天傍晚
都要爬上房顶
把星星叫醒
把月亮叫醒

有一次,我装作经过
叫了她一声
玉多,又在等连国呀
她说,
没有没有
只是想来吹吹风

哼,骗人呢
吹啥风呀
都快过年了
我都冷得缩成了一团

小的时候,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大人们爱说:“又进腊月门子了,离过年不远了。”“不远了”这句口头语在当时听来习以为常,进城30多年,一到腊月,我就会想到“不远了”,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一年比一年亲切。离过年一天比一天近了,忙年的序幕越拉越大:倒炉筒子、扫尘、糊窗、穿新鞋新衣裳、磨米磨面、蒸开花大馒头、包冻饺子、装酱油打醋、写对联刻挂钱、糊大红灯笼、练大秧歌请二人转……

那年月,过年有意思,忙年比过年还有意思。腊月里,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小孩小孩你别哭,过年杀头大肥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快过年了,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谁家蒸好了黏糕、豆包、馒头,一揭锅,热气和浓云一样,啥也看不见,只好开门放气。一开门,滚滚的热气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孩子们一见到谁家冒热气就跑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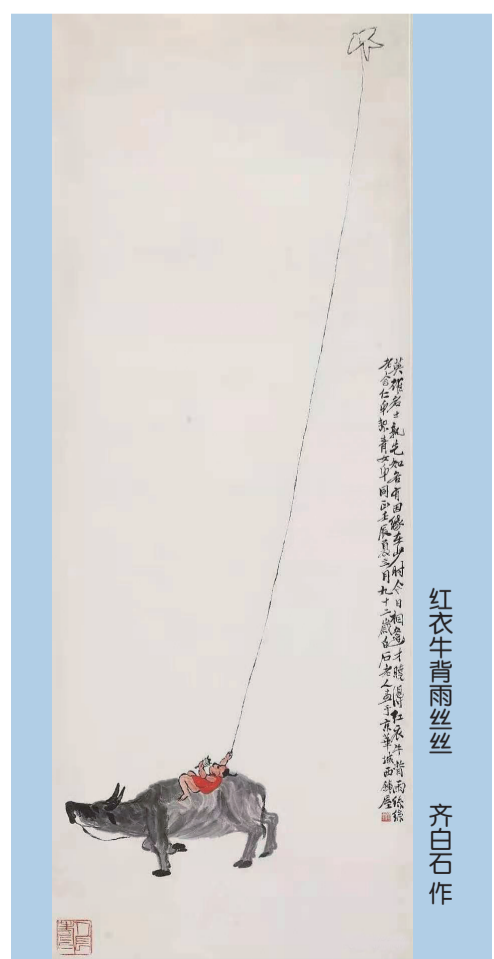
吃饱了的孩子该聚在一块堆儿起腻了,男孩拿一根燃香的香,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洋鞭,点燃后往没人的地方一扔。有的孩子拿着放,手被崩崩了,崩疼了,一搓巴掌也没啥事。丫头片子掏出头上戴的花,戴一会儿就摘下了,说留着过年再戴,还有的掏出红头绳、彩线互相显摆。这帮小家伙疯疯闹闹,嘴里一遍一遍地念叨民谣:“过年一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红毡帽,老太太跟着瞎胡闹……”

年的脚步近了,忙年的乡亲们更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小年刚过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四,大清早村里的广播喇叭就开始呱啦:有进城办置年货的沙楞(迅速)到村东头集合,王



大老板子赶车,去晚了可不等了……喇叭里的声音太大,震得耳根子麻木。村民们急忙往村东头赶,有人背着帆布包儿,里面的空瓶子叮当响,有人手里提溜着麻绳,还有人把三角兜搭在胳膊上……

不大一会儿工夫,马车周围全是人,拉外套的是一匹枣红马,马看人多了,兴许知道要过年了,嘶鸣助兴,孩子们蹦上马车玩耍,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杵子。徐老海冲马车上喊:“你们这些小生巴浪子都给我滚下来,没老没少的太不像话。”孩子们呼啦啦地跳了下来。大人们爬上车,红头



红衣牛青雨丝丝 齐白石作

新年

比画

巾、绿围脖、花袄罩,花花绿绿,像个忙年的样儿。徐老海张罗道:“剩下的人跟我走,咱爷量进城,二十来里地一撒欢就到了,驾步量比坐车强,伸胳膊摆腿的一点不冷。”

一帮人脚前脚后跟着徐老海往城里走,马车把行人甩得挺远,路过一个村子,马车转了一个弯儿,后边的人看见前边坐马车的人从车上下来了,跟在车后跺脚、抄袖、捂耳朵,慢慢腾腾地往前走。王老板子也下车了,抱着膀夹着鞭子迈四方步。徐老海比比画画地朝前指着说:“快看车上那些人,冻得哆哆嗦嗦受不了了,都下来了,你们看吧,没人敢坐车了。”大伙儿嘻嘻哈哈,讲一些笑话取乐,不大一会儿就追上前边的人了。坐车的和走路的,不知不觉一块堆儿赶到城里。

从城里返回来是满载而归,一路欢歌。车上装着大伙合在一起买的好几筐冻梨、冻柿子,还有冻豆腐、刀鱼、衣物、糊墙纸……马车上货物多,坐不下那么多人,只有几个腿脚不好的坐车,其余人全都步行。在这些步行的人群中,有人背着布包,里面有罐头、酒瓶、醋瓶、酱油瓶,还有的用三角兜兜拎着糕点、糖果、鞭炮……这些东西不敢往车上放,怕磕怕碰怕散花。

还有不同的忙年方式:范教员,忙着给全村人家写对联;周奶奶,忙着给家家户户剪窗花;杨胖子,忙着给乡亲们刻挂钱;陈大娘,忙着给孩子们炸麻花;福二爷,忙着给讲究的人家糊糊糊……

过去的忙年,对我来说是幸福而又美好的回忆。



油饺弯弯

□胡容尔

先声夺人了。

生胚子做好后,需要最后一道油炸程序的淬炼,方可功成。火候很关键,锅中油温升高后,以中慢火为宜,待黄澄澄的油冒出细密的小泡后,即可将饺子下锅,热油浸炸,过一会儿用筷子轻轻翻动,让两面着色均匀。等到饺子略微上浮、饺子皮鼓起,改成小火,炸至表皮泛黄稍硬后,再转为大火。此时,满锅生机勃勃,俨然风吹湖水,颇有“莲动下渔舟”的景致,似有许多尾金色的小鱼在水面上嬉戏、穿梭,再打个滚儿,便可被打上岸,控油。顷刻之间,油光可鉴的油饺,通体装扮得金灿灿、明艳艳。摆入白底子的碗碟中,宛若“玉碗盛来琥珀光”,秀色可餐。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吃不了热油饺。新鲜出锅后的油饺,要慢慢降温。等待降温的过程,需要时间的成全。品尝一口,只觉蜜汁溢流,香、酥、脆、甜。几味浓郁的甘美,在口腔里交汇,在舌齿间流转,萦绕,吐气如兰。味蕾之殊妙的享受,比起香喷喷的水饺,犹要胜过几分。

油饺,又叫油角,肚圆似荷包,是钱包的象征。广东人有“油角弯弯,家财百万”的说法。过年吃油饺,有钱包鼓胀、招财进宝的美好寓意。

天下之口,喜好不同。广东人仿佛只有吃过油饺,这个年节才会过得完整和踏实。人在天地间走着,大约都不能脱俗,总需要一些凭证作为支撑。或许只有守住根脉,日子才会过得有底气,有信心。